

“九头鸟”与楚文化

吴 秋 华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通过劳动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样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样式中,既凝聚着人的向往追求精神,也闪烁着人的创造智慧光芒。古代楚人是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在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原始的“荆蛮”曾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排斥,曾多次遭受侵伐和伤害,只是靠自身的顽强奋斗,才赢得了自立于南方独立地位的民族。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它大致以现在的湖南、湖北以及安徽、河南、贵州等部分地区为中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独特的、较为原始的习俗和方式。从楚文化遗风余俗,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土的楚文物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认识,其中,鸟,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天是众神之所居,鸟翱翔于天际,它比人更接近天,更接近神,于是鸟常被认为是神的使者,会带来天命。《山海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

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中“九头鸟”到底又是何意?笔者认为还是首先应从楚文化入手来认识“九头鸟”。《山海经》上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最早记载“九头鸟”的是讲九头鸟是神,是吉祥物。“九”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个“玄”数,至大无比,至多无穷。神是天

的使者，是人的主宰。“神”与“九”相联，更是体现着其中的玄妙。因此，不能简单地对“九”解释为数词（“九”），或动词（变化“九”次），或形容词（穷极无限）等。

楚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对“九”既有继承的认识，也有发展的独特注解。在中国南方民族中（包括楚民族）至今还没有神的概念，只有“鬼（巫）”与“大鬼（大巫）”的概念。人死谓“鬼”；大首领死后成神，使谓之为“九”。“九”是对神的称谓，顺此神秘性而推，“九”也是一种天机，是一般人解不开的玄语。因此在楚文化中出现“九头鸟”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为楚人对自然偶像的崇拜是楚民族灵魂的一种寄托。

然而在东方古典文化中缘何屡有对“九头鸟”的伤笔？如《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齐东野语》卷十九载：“鬼车鸟”、“鬼车，俗称九头鸟，世传鸟昔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甚至在《辞海》中也是如此记载：“九头鸟，亦名‘苍鹫’。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深究其因，还是得追溯到楚民族的历史中去。楚民族的形成发展中，是一部自强不息的斗争史。在古代，各民族，各地域有不同的“图腾神话”，在东方文化中大致是东崇龙，西崇虎，南崇凤，北崇虬的传统。楚人气魄雄大，富有奋斗和开拓精神，也常常沉缅在恢宏想象和迷信之中，笼罩着相当浓厚的南方气息和情调。随着楚人的艰苦劳动，楚民族日益壮大，楚人日益向社会显露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并不断地向外扩张。楚民族的强大，加剧大小国的矛盾。其他各民族，各诸侯国则把他视为一股祸水、一种灾难。于是楚人钟爱崇敬的鸟在其他民族的笔下自然就有另外一种恶意的诠释，特别是在北方中原、齐鲁等地就更为厉害。他们借“九头鸟”影射楚民族，称“九头鸟”为不祥怪鸟也就顺此而生。

楚文化博大精深，简要可用“巫”、“道”、“骚”以概之。“巫”、“道”、“骚”是原生的巫学、道学、骚学，为楚民族所特有。

《国语·楚语》中记楚人学者观射父最早给巫做了确切的界说，因而日后流传“小巫见大巫”之说。春秋晚期以后，楚文化步入鼎盛期，巫学开始分流，其因袭罔替者仍为巫学，其理性化者转为道学，其感性化者转为骚学。

在楚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汉代楚民族中出现了下层阶级反抗压迫的斗争尤为突出，象黄巾、赤眉起义一样，在农民底层流传着一些顺口溜：“……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同样，从楚地始传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歌谣，这些歌谣的传出，隐示着楚人自己即将联合反抗，夺取政权；即将象楚人先祖、九头鸟一样显赫扬名。它号召楚人及受压迫的人们一起起来反抗，否则就属违反天意。所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原意不是其他方面，而是楚人对自己文化的发挥，巧借“巫”“道”“骚”学和迷信，对统治压迫的一种呐喊，对天意、命运所预设的一种征兆。

惟楚有材。异彩辉耀的楚文化给神奇东方带来恢宏气象，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既为楚文化所养育，又为它增添无限魅力的伟大诗人屈原“使楚于十五国之外，鬻然有以自见”，他无愧为楚民族的骄子。后世也是人才辈出，集楚于一地。基于此，有人借“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对楚人的才能、智慧加以毁谤污蔑，反语讽刺为楚人的一种狡猾也是常有之事。明朝政治改革家、楚人张居正就是一例。当他的突出才能一显示出来就被反对派诬为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地推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歌谣，在皇帝面前妖言张居正的“莫须有”。

总而言之，“九头鸟”是在楚文化、楚民族的发展繁荣中而赋予超乎“九头鸟”自身的生命和精神。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咸宁地区文联《九头鸟》杂志社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